

门卫老方

柴明华



门卫老方大我一岁,今年七十五,腰杆笔挺,耳聪目明,红光满面,板寸头有点花白,那身中山装制服和千层底布鞋总显得十分干净整洁,而在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——那辆老爷三轮车上老是能见到沾着泥土的套鞋和工作服,他说那是他在地头干活时穿的。清早刚从菜地过来,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就到公司接班,可在这儿上班总得换一身衣服,穿得像样点。

我们公司这一个车间租用在另一个工业区的厂房里,工业区大门口设有保

安,车间的门卫主要负责员工的考勤以及内部的日常卫生保洁工作,所以年龄大一点的人也能胜任。老方已经在这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好多年,员工们对他的工作态度和能,反映很是不错。因为以前担任过生产队会计,所以考勤记账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,员工的出勤、缺勤、迟到、早退账面上记得清清楚楚,一目了然,从无差错。厂区内的清洁卫生也搞得很好。

完成了分内之事,他还会主动找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来做。比如,供应商发过来的零部件很多都有木制的包装,他就会主动帮仓库管理员仔细地把它拆开,把钉子一枚枚拔出来敲直,集中收藏,将木板和木条整理好捆起来交给库房。他说:“等我们要发货时可以制作木箱,这样就不用到处求人做包装箱了。”再比如:他的床下藏着一套修补自行车的工具和打气筒,只要一发现员工停在车间边上的电动车、自行车漏气了、瘪胎了,他就会主动帮着打气。如果早上打的气,中午又瘪下去了,下午,他可就会像修自行车的师傅一样,将你的自行车的外胎剥下来,取出内胎,寻找漏气的地方,然后,仔细地用那把老式的铁皮锉刀反复地锉,再涂上胶水,打上补丁,等检查不漏气后动手恢复原状,让员工下班时平安回家。

我见他这么大年纪还这样忙忙碌碌,就劝他不要过于劳累,他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反正就是一天,坐着也是一天,做做也是一天,做人,做人,只要做得动,还是多做做的好。”

老方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不沾烟酒,不赌钱。在厂里吃饭时的下饭总是一些“地货”:青菜、萝卜、芋艿、马铃薯等等,而且和我一样喜欢清蒸。不过他吃的都是自己种出来的时新菜,不吃反季节蔬菜,因为他有很多菜地,种的蔬菜自给有余,还经常踏着他的老爷三轮车到市场上去出售。

其实老方家庭条件很好,根本不缺钱花。子女早已成家立业:儿子开车跑运输,孙女今年就要结婚了;女儿过得更滋润,大学毕业以后夫妻双双在本区的一所中学当教师。老两口在征地拆迁时参加了社会保险,还分到了不少补偿款和两套一百来平方米的住房。

本可以享享清福的老方就是闲不住,因为我们的门卫是两个人隔天轮流值班,这空下来的一天,他也不愿意宅在家里或像其他老人一样聚在村头的热闹处说长道短,而是总想着背上他那把锄头到地里去干活。可是土地全被征用了,连自留地也没有了,到哪儿去找土地呢?真所谓“懒汉不会没有凳子坐,勤快不会没有生活做”,老方就“见缝插针,化零为整”地在路旁、河边、荒芜的屋基地等零星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小块,一小块菜地,不厌其烦地种植、培育、收获,偶尔有人顺手牵羊割走几株青菜、挖去几棵芋艿,他总是一笑了之:“谁吃不是吃,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。”说说轻松,其实弄蔬菜要播种、松土、锄草、施肥、防病、治虫等,是一件很细碎、很麻烦、很劳累的农活,恐怕也会吃不消吧。老方却乐此不疲,他常常很骄傲地对我说:“我的菜

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,就算价钱高一点,很多老顾客还是愿意买我的菜。因为我基本上都施绿肥,不怎么用化肥,治虫用药也是算好了日子,不让农药残留在出售的菜叶上。他们说不但好吃,而且放心。”

我问他,你这么大年纪还辛辛苦苦赚这些钱干嘛?他笑了,他说:“我这么喜欢干活不是单单为了赚钱。一则是因为我们这种人是天生的‘劳碌命’,不到地里去活动活动,‘绞股’(关节)会生锈,二则么,我也要做好家里的‘门卫’。”

家里的“门卫”,这是什么意思呢?老方笑了,他说家里的门卫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们不要丢了种田人的老传统。

老方认为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拆迁征地,很多世代代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兄弟分到了一套或几套房子,拿到了补偿款,又享受着社会保险,不少人一夜之间从温饱线挤进了富翁的行列。这一夜暴富使有的人头脑发热,手足无措,整天就盘算着怎么消费这手头的大笔资金和几套房子,就这样丢弃了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,整天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,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。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下一代,如果孩子也坐享其成,岂不毁了一个个家庭。

“所以,”老方说:“我要给自己的子女做一个好榜样,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做人、做人,就必须好好做,哪怕你的钱再多,如果不做,也会坐吃山空。”

他这个门卫,就这样守护着自己的家风。

我和房东的缘分

江泽涵

在外地工作,需要租房,中介推荐了中心区的一套单身公寓,设施齐备,装修颇精,也宽敞,而且,地段好,环境好。月租金1400元。

“租不租没关系,相逢就是缘,交个朋友也好。”女房东30岁左右吧,打扮入时,人也爽快。以我的收入,负担本不大,可想来还有些贵,就婉谢了。

女房东当晚就打来电话(号码从中介那儿要来的),说和我有缘,她也挑房客,必须爱干净,就1200元,又避开中介,佣金都省了。找房子,搬家,实在费劲,而她给我的印象不错——也就认了。

签合同,见到她的身份证,41岁!比年龄年轻了这么多,该是心境豁达的人吧。听保安说,她还是个能人,在这个小区就置了4处房产,还买了各种理财,算是富婆了。

“小阿弟,缺什么,尽管跟阿姐说啊。”女房东还找了朋友来,帮我添置或替换了一些家具。

我真有些感动:“谢谢阿姐。”

阿姐待我很亲热。她住14楼,经常叫我去聊天,家里的陈设如她的穿着一样有品位,生活却简朴,饮食很素净,水果

都是廉价的。我就纳闷,她老公常年不在吗?还是她自己无意说出来的——至今未婚。“你这样好的条件……”我实感惊讶。她说怕人家只是冲着她的钱来的,就算交普通朋友也很谨慎。我想她会和我交好,可能是认为毕业不久的人单纯吧。

我带了老家的特产,会给她送去一份;聊天时,也会分享一些生活经历;一两好友聚餐也会叫上她。阿姐客气客气,也欢喜着答应了。

这一天,阿姐情绪很低落,债主跑了,借出去的80万元捞不回来了。她捶胸顿足,“大家是朋友,我才好心帮他的呀,这挨千刀的……”

其实,债主是她朋友的朋友,给的利息实在高!这是我后来听出来的。

后来,她喜欢和我谈自己的创业史,竟能聊到凌晨。她几乎没什么朋友,她和她所谓的许多朋友都是因为利益而走在了一起,也终因为利益而分开。

一个月后,热水器出了故障。她很快找来了物业。经检查,说是机器本身问题,而非电路方面原因,要找售后。她来电告诉我售后的电话,又匆匆挂了。

这不是房东的责任吗?我工作忙,一

拖就是一个月。这期间,她再没来找过我聊天,也没个电话来问一声热水器的事。有一次在超市门口,我明明看见她在看我,结果是她避开了我。

我一个电话探清了虚实。原来机器已在保修期外,上门费、调试费、零件更新,哪个不要花钱?

几天后的晚上,我下班碰见了隔壁的邻居,他问我房租。我一报价,他愣大了嘴:“用不了这么贵吧?”

——我决定搬家。

“我们因为之前处得好,否则,直接把你的押金吞了!这样吧,你找好转租的,只要别让我的利益受损失!还有,搬走前,必须把热水器修好!”

第一次发现她竟这样雷厉风行。我联系了售后,维修师傅上门,说零件已到了退休的年龄,新配件要三天后才能到。

只不过新房客却提前十天到了。女房东找了朋友助阵,硬要从押金里扣去100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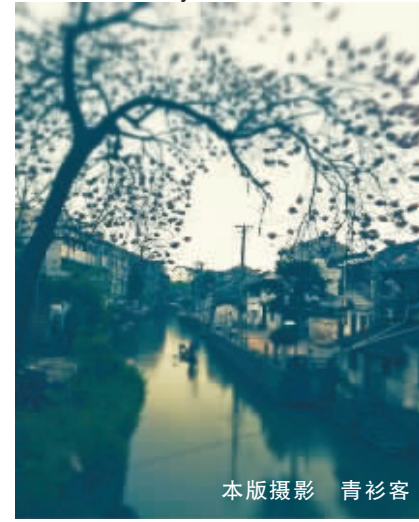
“师傅也说了,这人为造成的……”

“这不用跟我说的,总之,我给你的时候是好的!”接着,又使诈坑了我未到期的十天房租。

总第 5652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本版摄影 青衫客

好聚好散,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聚散是缘分,“好”字却是情分。即使缘分尽了,情分却可以长存。只可惜,我也不过是她众多走散的“好朋友”中的一个。

她的热情,她的笑,原本还能定格在我昔日的记忆里,如今,已烟消云散。

有一天,我在超市看见她了。我们两个人平静地擦肩而过,谁也不认识谁。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7

我还植入了一个信息,那就是:媒体与使馆人员不同,撤与留,记者应该有独立和职业的判断。路透在这里,美联在这里,目前伊拉克还有约200名记者,新闻大战没有结束,我们没有理由走!我甚至故意“提醒”:凤凰卫视也马上会派第三批记者来,当然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会是闻丘露薇。

台里很快回复,肯定了我们的工作,但走还是不走,迟迟不给说法,只是说,按照惯例,央视记者出境采访,既受台里的领导和指挥,同时也要听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意见。

我决定“转攻”大使馆。

我们报道组跟使馆的关系十分融洽。从张维秋大使到司机、勤务员,都对我们很好。正月十五的时候,使馆还邀请我们一起包饺子。当时使馆虽然有通讯工具,但主要用于外交用途,一般情况下不能私用。为了表示感谢,我们把海事卫星电话拿到使馆,让所有的

使馆人员,从大使到厨师,一二十人,每个人给家里打3分钟电话,他们打趣说: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友情赞助。这些事现在想起来,都觉得非常温暖。

但是战争里面没有温情,只有生死。我希望张维秋大使能够理解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,但是我也很清楚,形势逼人,很多事不是大使一个人能决定的。

在张维秋大使的办公室里,我们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。

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说:“想留在这里,并不是我水均益个人想出名,想要博得一个‘战地英雄’的光辉名号。而是我们作为新闻记者,有这样的职业追求。我们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了好多天,现在撤离的话就功亏一篑了。如果临到了眼前,却放弃记录这段历史,我们会良心不安。”

张维秋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,人也很和善,他沉思了一会儿说:“小水,我很理解你的心情,但是战争一触即发,留下来真的很危险,我们作为驻地使馆人员,首要的还是要考虑你们的安全。你看,也不是只有你一家撤,新华社也已经准备撤离了。”

“我们会非常注意安全的,”我有些着急,绞尽脑汁地解释,“新华社做的是文字新闻,他们可以根据外电、根据伊拉克当地媒体的报道,整理出很漂亮的文

字稿。但是中央电视台不行,我们作为电视媒体,需要现场画面,离开现场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类似的话,我反复说了好几遍,听上去有点像强词夺理。但是,我必须这么做,把任何道理,都往“我们必须留下来”上说。张维秋大使很耐心地听完,最后表示,他很理解我,也会充分考虑我的想法,会使馆给国内提供一个建议,但这事确实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。

我走出大使馆,抬头望天,战云密布,依然阴沉。

2003年3月初,使馆开始忙碌起来,人们进进出出准备撤离,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开始腾空。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开始变得单一:保持正常的报道连线,每天跟白岩松相约《直通巴格达》,整个报道组全力以赴,“赖着”不走。

经过充分考虑,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:实在顶不住压力,作为缓兵之计,先部分撤离。

冀惠彦一边啃阿拉伯大饼一边瞪着我:“谁愿意撤吧?你说说。”

我说:“我、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,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,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。陶冶和康锐俩小伙子还年轻,还没成家立业,按道理,也该让他们先撤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